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图书馆 主办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LIBRARY



经管学科参考

2018 年第 7 期 总第 23 期

经管学科参考

2018年第7期·总第23期

热点观察

| | |
|--|----|
| 山寨食品横行农村成健康“隐形杀手” | 1 |
| “租金贷”风险多地爆发 租客“被贷款”苦于维权 | 3 |
| 长三角竞跑“智能制造”提质增效 | 6 |
| 进博会中以合作篇：国术科技与 Eyeclick 公司推进融合发展 | 10 |

学科前沿

| | |
|--------------------------|----|
| 国有企业双重目标下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 12 |
| 世界经济发展策略转变：宏观到微观 | 17 |
| 以长远视野统筹推进减税降费 | 20 |

经管资讯

| | |
|------------------------------|----|
| 9万亿美元！巨额企业债成为美国经济的定时炸弹 | 23 |
| 国际油价何处寻底？ | 24 |
| 全球经济同步复苏进程遭遇阻力 | 25 |
| 协议获欧盟通过 英国“脱欧”仍存变数 | 26 |
| 日本经济年末面临下行压力 | 28 |
| 维护多边合作机制 提升对华合作水平 | 30 |

山寨食品横行农村成健康“隐形杀手”

“六个土核桃”、“Cole 可乐”、“康师傅”……《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四川、广东、宁夏、江西等地调研发现，农村成假货山寨食品的主要销售集散地，在小超市、小卖部、集市等地方，山寨食品泛滥。有的山寨食品在农村卖得不错，有的甚至销售火爆，而不少农村孩子长期食用山寨食品。由于山寨食品在质量上难以有保障，已经成为危害村民健康的“隐形杀手”，整治农村山寨食品已经刻不容缓。

1 “六个核桃”变“六个土核桃” 山寨食品横行农村

“六个核桃”比较知名，然而，在一些农村地区，“六个土核桃”竟然也很走俏。

近日，四川渠县工商质监局查获了一起山寨“六个核桃”的案件。在渠县一个乡间仓库里，执法人员现场发现了 569 件“六个土核桃”饮品。“六个土核桃”包装与知名饮料“六个核桃”相比，除了个“土”字，其他颜色、字体、图案近乎一致。经查，当事人共购进 1000 件“六个土核桃”进行销售，截至被查获时已销售 431 件。



在四川东部某市的一栋居民楼下小超市，记者看到，一批“六个纯核桃”饮料竟然也在公然售卖，销售人员竟然宣传，“这是‘六个核桃’的升级版，口味更好喝”。而前来购买的村民也没有发现其中异样，不少村民都以为自己购买的是“六个核桃”饮料。

“小娃娃一直喜欢喝这个饮料，我们经常在这里买，没觉得有啥不同呢。”刚买了一瓶“六个纯核桃”的村民李奶奶说。

在宁夏中部某县的一条商业街上，记者走进一家名为“海捞汇时尚自助火锅”的火锅店，一眼望去，店内满满两货架均摆放着“芬达”“农夫山泉茶π”“可口可乐”“汇源果汁”等饮料。

记者走近才发现，货架上除了“非常可乐”是正版以外，其他品种的饮料全部是在外观包装、图案设计上高度仿照、抄袭大品牌的疑似“山寨”货：“茶π”变“果π”，“Coca Cola 可口可乐”变“Cole 可乐”……粗看之下与“正版”别无二致，但仔细观察则能看出，虽然这些饮料和大牌使用了极其相似的元素和风格，但图案都较为粗糙。

在西部某省一乡村电商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店里一种与红牛饮料很相似的“维生素饮料”和红牛饮料摆在一起售卖，且价格均为 6 元，两种商品在饮料罐材质、印刷上都非常相似。商店女老板告诉记者，这两种“红牛”都是真的。见记者拿着手机对着疑似山寨的“红牛”进行拍照，女店主又改口说：“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这个是朋友放在我这售卖的，不是从外边进的货。”

2 商贩“打游击” 调查取证难

一些山寨副食品、饮料的商标和正品品牌的商标稍微有一点点差距，而包装基本一样，不仔细看

很容易混淆。一些店家也常常故意混淆宣传，常常把山寨食品当作正品卖高价。

金科是湖南省桑植县康师傅代销人员，他告诉记者，他们经常遇到山寨产品，例如橘片爽，一些山寨品牌做得十分逼真，外观包装几乎一模一样，很难发现其中的端倪，有一款橘片爽，在外观包装上，仅仅只是包装盒子上一个人物头像上多了一双眼睛，其他的跟正品一模一样。

“虽然知道是山寨的，但是我们也没办法。他们有自己的名字，只是稍微不一样，也有生产日期、生产地址等，不好定位为山寨，只是模仿，很难界定为抄袭。”金科说。

“山寨商品进入农村市场的方式，往往是通过周边县城或集镇上的批发商超。供货商送货上门到此类批发商超，导致执法部门查找山寨商品的源头十分困难。这些山寨货的进价可能只比正品便宜一两元钱，有的商超店主抱着‘不要白不要’的心态进货。”江西一位工商质监系统执法人员透露，此类情况通常只能按照侵权来处罚经营户，罚金为所售商品进价的3-5倍，这样的罚款往往过低，不足以达到惩戒效果。

四川达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执法人员说，不少山寨食品是趁农村赶集时售卖，主要是一些流动小商贩，都是一次性买卖，卖了就换下一个乡镇，要追踪调查取证非常困难。

3 村民成售假者眼里“软柿子” 市场监管亟待加强

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农村山寨食品泛滥由来已久，在一些地方甚至见怪不怪，不少售假制假者毫无顾忌，有恃无恐。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分析说，山寨食品之所以能堂而皇之进入农村市场，一是成本低、利润高；二是监管触角鲜有触及，存在监管不力问题；三是偏远乡村农民鉴别识假能力有限；四是有些人明知道是山寨食品，但图便宜仍然购买。

“我们卖了几年了，也没出个事，而且村民们还喜欢喝这个饮料，怕什么呢！”在四川达州查处山寨食品过程中，当地一位山寨食品经营者仍然不知悔改。

“现在，农村村民对山寨食品还缺乏辨别能力，深受其害而不自知。”达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一位执法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在查获“六个核桃”山寨食品时，正当执法人员准备将仿冒饮品运走封存时，自称货主“朋友”“邻里”的一群人围了过来。“这个有厂名厂址，又不是三无产品”“老板也是才进的货，你们这样没收了，老板要亏惨”“这个我喝过，没得问题”，七嘴八舌提出质疑，企图混淆视听，一时之间，双方僵持不下。与此同时，周边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也越来越多，不少群众甚至还指责执法者。而这样的情况不止一次出现，给现场执法带来不小的困难。

“反正喝了又不死人，我们娃娃平时经常喝，也没出现问题。”四川一位村民对记者说，他们村的娃娃都喜欢喝这些山寨饮料，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记者了解到，对于属于食品类的山寨商品，市场监管部门在日常执法中也存在困难。“因为现有法规缺乏操作细则，在基层落实比较难，一般在没有造成危害人身安全的严重后果情况下，执法部门不会主动进行产品质量检测。而且，由于农村经营者的承受能力有限，市场监管部门存在‘立案后难以结案’的风险。”江西一位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坦言。

作者：董小红 袁慧晶 何晨阳 李雄鹰（记者）采写
来源：《经济参考报》2018-11

“租金贷”风险多地爆发 租客“被贷款”

苦于维权

——专家呼吁尽快补齐监管短板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今年以来，长租公寓“租金贷”爆雷事件频发，不仅事关租客的合法权益，也折射出一些金融机构开展业务时公平诚信和业务规范的缺失。专家认为，“租金贷”作为金融创新模式已经明显跑偏，随着各地陆续爆发租金贷风险，亟待监管部门出手统一监管，建立健全住房租赁市场监管体系。

1 “馅饼”成“陷阱” “每月付租

金其实是还贷款”

来沪工作的26岁青年郑高阳，近期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背上了一笔消费贷款，若不还款每天都在产生违约金。近期，上海长租公寓企业“寓见公寓”资金链断裂，不少像郑高阳这样的租户不仅被房东驱赶，拿不回租房押金的同时，还发现自己背上贷款。



“零中介费”、“拎包入住”、“按月付租金”、“管家服务”……看起来很美的长租公寓吸引了不少像郑高阳这样的租客。郑高阳今年8月10日通过总部位于上海的寓见公寓平台租了一间房，管家告诉他，缴纳两个月押金后，只要签一年的合同，并按月支付租金，就能获得租金优惠，由原来的每月1800元优惠到1710元。

郑高阳心动了。“管家说帮我操作，拿我的手机下载注册了一个元宝e家的APP，说是开通账单分期付款的功能，绑定银行卡，以后每个月把租金打入卡中就可以自动扣款。还让我手拿身份证拍了照片，当时我以为这是寓见公寓租房的手续。”

其实，元宝e家是一家类似于助贷机构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公司，背后的贷款资金提供方实际上是消费金融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元宝e家的收益是金融公司给的贷款佣金。

郑高阳办理的正是这样一笔由元宝e家为中间商、晋商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商消费金融”）为放款方的一年期18810元租金贷，每月所谓的付租金，其实是在还贷款。通过受托支付，晋商消费金融将18810元一次性支付给寓见公寓平台。

寓见公寓的运作模式渐渐浮出水面。寓见公寓和房屋所有者签署3-5年甚至更长的租约，分期付款给房东，将房源重新装修后，在平台上转租给租客。然后通过合作的第三方金融公司，用隐瞒、欺诈等方式层层诱导租客签下贷款合同，一次性套取租户贷款，从而沉淀大量资金用于再扩张。据记者了解，第三方合作金融公司和链条众多，既有消费金融公司、P2P平台、助贷机构，也有建行、浦发等传统金融机构。

但是这一链条，在寓见公寓经营管理不善、资金流断裂后被打破。10月底，郑高阳在寓见公寓租房两个月后，从未打过交道的房屋所有者突然到访，称寓见公寓已经倒闭跑路，房东没有按期收到寓见公寓的房租，要求租客搬离。

“房东和寓见公寓签了4年租期，到今年年底就到期了，但我和寓见公寓签的租期却到明年8月份，背下的贷款也是一年期。”郑高阳这才知道自己早已落入了陷阱。

而此时，寓见公寓已经“爆雷”，APP无法打开、管家失联。雪上加霜的是，他收到了第三方公司要求继续按月归还贷款的通知，如果不按期还款，会产生滞纳金同时影响个人征信。

“原来元宝e家的APP内，订单详情里只有房屋租期、分期金额、分期数、租房起止日期，根本看得出来是一个贷款产品。但寓见公寓爆雷以后，却多出了一个‘晋商分期借款合同’一栏，点开，是一份晋商消费金融个人消费贷款客户知情及风险告知书，借款人是郑高阳的电子签章，而这个签章我从来没有见过。”郑高阳说。

多名租客向记者证实，均有相同情况出现，只是有的租客的贷款人是晋商消费金融，有的是别的银行等机构。作为没有金融资质的助贷机构，在和寓见公寓合作“租金贷”的过程中，元宝e家被认为也有蓄意隐瞒等诸多违规动作。

2 租客成牺牲品 维权追责面临窘境

据《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采访，不少长租公寓平台都通过隐瞒合同内容、诱导、欺诈等方式，利用租客个人信用申请办理租金贷。而一旦爆雷，租客就成为最大受害者，租金贷的风险和问题暴露无遗，但租客却面临维权追责困难的窘境。

“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押金拿不回来的就算了，查了央行征信报告，确实有一笔晋商消费金融的消费贷款。1.8万元的贷款发放到了寓见公寓，现在却还要我来还贷，不还款的话到时候会有征信污点。”郑高阳感到很沮丧。

据了解，寓见公寓为上海小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旗下品牌。其官网信息显示，成立4年以来，管理资产超过300亿元。现已布局上海及华东地区，已开门店43家，开业房源数超过2万。涉及的租客人数不少。记者了解到，目前寓见公寓上海租客建立的一个维权QQ群人数已超过2000人。

日前，记者在寓见公寓公司总部看到，大门紧闭，门上张贴的公告称，公司因为整个行业的深刻变化和调整，以及自身的经营管理不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资金短缺，公司股权已全部质押给贷款银行，账户管理权已被贷款银行全面接收，公司已经没有任何资金可以调配。

日前，作为资金方之一的上海华瑞银行也向寓见公寓发出信贷资产安全告知函。告知函显示，此前华瑞银行向寓见公寓发放了专项贷款，用于长租公寓房屋装修。鉴于寓见公寓经营的部分长租公寓装修资金来自华瑞银行贷款，相关房屋出租产生的租金收入为上述贷款的还款来源，寓见公寓须充分保障上述资产安全，未经华瑞银行允许不得擅自处置上述装修资产。

寓见公寓的问题并非首例。此前，杭州鼎家公寓“爆雷”，近日北京昊园恒业也出现同样情况。租金贷一旦“爆雷”，租客就成为最大受害者，其风险和问题暴露无遗，而租客维权追责却面临窘境。

“租房所在区的派出所、法院都找了，但都不立案。”郑高阳想找律师帮忙打官司，但考虑到数额不小的律师费，他又犹豫了。“只能向监管部门投诉，但也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9月10日就曾经通报称，长租公寓相关投诉今年猛增，亟待相关部门加强监管。部分长租公寓中介服务机构误导消费者通过与其合作的第三方金融机构进行贷款，以

消费者的信用风险换取资金保障，一旦经营不善，极易造成消费者面临个人资金或征信风险。

郑高阳告诉记者，原本想尝试一下信用租房，可以月付租金减轻压力，没想到却沦落到无房可住还要还贷款的境地，当时真不该相信寓见公寓这个品牌，也不该下载分期支付的软件。他的心声也代表了很多租客无奈的声音。不过，这也反映出，在金融创新花样不断翻新的今天，不少消费者的金融安全意识淡薄。

记者接触的一家消费金融公司相关人士向记者坦言，贷款已经一次性支付给寓见公寓，如果租客不继续还款，他们也面临不良贷款问题。他说：“我们只是背后的出资方，我们收到的借款合同、借款人签字等都是齐全的。至于这些租客是怎么签下这些合同的，是不是不知情，是不是被欺诈，这些和元宝 e 家这些赚取佣金的助贷机构以及寓见公寓这种长租房平台有关。”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陈岱松则认为，租客在不知情的条件下签署借款合同，而且所借款项不进入租客帐户，如果出借人没有明确告知“租金贷”的内容，出借人则有相应责任。租客属于受害者，在不能续住的情况下，可以不还之后的“贷款”，同时向出租方主张违约责任。

3 无资质却充当资金桥梁 绕开监管暗藏风险

随着长租公寓不断“爆雷”，“租金贷”诸多市场乱象和金融风险也浮出水面。

首先，贷款误导严重、信息披露缺失，“租金贷”变身“套路贷”。根据记者的调查，为了吸引租客接受“租金贷”方式，在实际操作中，长租公寓运营商通常会采取隐瞒、误导和给予一定优惠的方式诱导承租人办理分期贷款。

例如，有的运营商甚至会承担房屋承租人部分或全部的贷款利息。郑高阳“被办理”的晋商消费金融贷款就是如此，为了掩饰这是一笔贷款，记者看到，郑高阳办理的贷款为零利息零手续费，也不显示“贷款”二字，只显示为“分期业务”。所以，郑高阳一直以为自己只是办理了房租月付的手续。

其次，绕开监管，业务风险突出。尤须警觉的是，市场逐渐涌现出诸多租房分期信息服务平台，如元宝 e 家、分付君等，他们没有金融资质，不受金融监管和约束，却充当资金桥梁的角色。这也导致了他们可以有恃无恐地和寓见公寓这类企业联手坑骗租客，在不知内情等情形下签下贷款协议。而背后真正受监管约束的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持牌机构，则可以理直气壮地称自己不违规，因为有贷款合同、有租客手持身份证的照片认证、授权等。

“不良企业诱导租客与互联网金融平台签署贷款合同，是违法违规行为。”陈岱松表示。

另外，管理能力薄弱，资金违规挪用。陈岱松表示，长租公寓通过手中扣下的“租金贷”，疯狂抢占房源，使得公司规模如滚雪球般迅速膨胀。只要租房市场处于上行期，且有持续的新房源和源源不断的新客户入场，长租公寓的资金自融链就不会断。但是一旦房租停止上涨甚至下行，长租公寓的资金链就很有可能断裂，无法继续支付房东的租金，从而导致全行业的大崩盘，引发严重的法律问题。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指出，防范“租金贷”业务风险的机制主要关涉两个层面：一是底层借款人（租客）的还款意愿和能力；二是长租公寓运营商的融资和风控管理能力。然而，在这些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一旦资金回款出现问题，不仅对自身经营产生负面影响，还会直接牵扯到房屋承租人、出租人、放贷机构及投资者。在已经“爆仓”的事件中，资金违规挪用导致的信用偿付能力降低均无一例外地成为导致长租公寓运营商倒闭或者跑路的最后一根“稻草”。

4 “租金贷”管理存空白 亟待补齐监管短板

“租金贷”业务蕴藏的风险已经对金融市场和社会稳定构成一定冲击，下半年以来，西安、杭州、上海、重庆等地都相继发文规范“租金贷”业务，进行风险提示。但眼下，前期积累的风险处于加速爆发期，监管举措如何具体落到实处？消费者如何不成为违规企业“爆雷”前的牺牲品？爆雷后消费者权益又如何保障？尽快解决这些问题都是当务之急。

巴曙松认为，“租金贷”客观上形成了资金池和期限错配，杠杆高、风险大，但从各地已出台的监管政策看，我国目前尚无针对住房租赁信贷业务方面的统一监管规定，对中介机构联合金融机构等发放的租房贷款要求也并不明确，对网贷平台发放的“租金贷”等管理也存在空白。建议我国应当积极加强制度建设，尽快补齐监管短板。

上海市住建委等五部门9月底印发的“租金贷”相关业务规范通知要求，企业合作开展个人“租金贷”业务，应当事先征得原始房东书面同意，不得强制或诱骗租客使用个人“租金贷”，不得在签约前收取定金或设置其它条件；对于代理经租企业可能出现的资金链断裂风险，通知规定，企业应当严格把控自身杠杆率，密切关注企业流动性，个人“租金贷”放款周期要与向房东支付租金的周期相匹配；同时，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审慎开展个人“租金贷”业务，合理确定个人“租金贷”额度和期限，贷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住房租赁期限。

其实，租金贷作为一种融资创新模式，原本不是“洪水猛兽”。但在长租公寓平台公司一窝蜂式发展的背景下，租金贷“跑偏了”。

“租金贷”牵涉主体较多，涉及证监会、住建部、银保监会等多个部门的职责职权。巴曙松认为，首先应明确监管主体职权，建立健全住房租赁市场监管体系。建议制定统一的管理细则，明确从业机构管理要求，规范住房租赁信贷行为，加强住房租赁信贷审慎经营；另一方面，要细化监管职能，确保在市场秩序、租赁关系、监管体系、投诉渠道、惩罚机制上形成强制约束型的制度安排。

其次，通过好的制度设计来保障承租人利益和有效化解纠纷。一方面，应对长租公寓租房分期付款的所有参与者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和信息披露，同时明确规定长租公寓运营商的制度流程，加强与承租人的信息沟通，尽到对承租人告知责任，充分保护承租人作为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另一方面，为了防止长租公寓运营商利用“格式”合同和“霸王”条款侵害承租人利益，可以由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出台“示范性”合同，作为租房过程中的合同模板，除了保留必要合同条款，应当尽可能地简化合同流程，保障承租人权益。

作者：王淑娟（记者）/上海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18-11

长三角竞跑“智能制造”提质增效

——业内人士建议，成本和收益须考量，政策体系有待细化完善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走访长三角部分制造业企业发现，很多企业开展了“智能制造”，推动效率品质提升，带动平均收入水平增加，促进用工结构改变，不断增强整体竞争力。

据了解，“智能制造”的方向不是简单地用机器去取代人，而是用机器辅助人。实施“智能制造”

后，制造业主要减少的工作将是技术密集度低的简单体力劳动，同时增加就业，主要是高端技术和技能岗位；换上的是智能化生产线和信息化生产管理系统，对生产工人的技术水平、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与此同时，“智能制造”开展过程中，资金、设备、人才等方面问题凸显，成本和收益必须考量，政策体系有待细化完善。

1 提质增效再造流程

生产线上，机械臂轻松抓起一块钢化侧板；工厂通道里，AGV 搬运机器人“按图索骥”有序托运各区域物料；指挥平台上，每位电梯维修保养人员的路线轨迹实时显示……在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偌大的智能工厂里，记者看到，大部分生产线都只有三五名技术人员在管理，他们利用电脑动动手指、发布指令，一群机器“工人”立即响应。



该公司工业工程经理张雪健介绍，通过实施“智能制造”，公司生产过程自动装备的数控化率提高至 80%，生产良品率提高至 99.8%，生产线自动化工位占比提高至 70%以上，人均生产效率提高 60%以上。

记者在长三角等地走访发现，“智能制造”成为地方政府和制造业企业应对招工难、用工贵问题的有力举措，有效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

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介绍，企业通过智能工厂建设，关键工序自动化焊接率从 40%提升至 90%，产品一次交验不合格率降低至 1%，焊接、数控一人多机水平提升至 1 人 10 机和 1 人 3 机，在线检测覆盖率达到 80%。

嘉兴捷顺旅游制品有限公司业务总监徐洁琼说，企业 2017 年投资 600 多万上线了注塑自动化工厂技改项目，从人工注塑变为自动注塑，车间用工 120 人减少到 60 人；2016 年开始实施的管件全自动冲压无人工厂项目，车间用工从六七十人减少到 6 个人，产能翻一番，产品优等品率还比人工冲管提升了近 3 个百分点，达到 98%以上。

今年 6 月，上汽集团成立了人工智能实验室，首个人工智能产品 Spruce 系统可以提供关于需求预测、路径规划、全局优化调度的物流综合解决方案。以某企业长三角物流项目为例，过去需要 5 个人 2 小时完成的具体方案，现在借助 Spruce 系统，一个人 10 分钟就可以完成。

浙江斯菱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金鹏介绍，公司一个车间的智能改造进度达到 40%，过去这个车间 43 人，每月产值 342 万元，现在 32 人，每月产值 347 万元。改造后，产品品质提高，机器响应时间快，能够快速发现并解决问题，产品合格率提高 3%。

近几年，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在企业职工人数增加不多的情况下，工业生产总产值保持 2 位数增长。新昌县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何晓峰说，2013 年以来，“智能制造”被摆在全县工业转型升级工作的重要位置，不但有效提升工作效率和产品品质，还成为企业打开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比如，三花股份膨胀阀生产线“智能制造”后，班产效率提升 20 倍，并与通用汽车、宝马、奔驰等国际知名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

“智能制造”正在再造工业生产流程。车间里，工作人员和机器紧密配合、相互协作；车间外，屏幕上显示着每条生产线的操作人员名单、温湿度、缺料预警等信息。这是位于南京的中国电科十四所基于数字孪生技术打造的工信部电子组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车间。

这样的智能车间正在不断为工业产业升级赋能。“每一个轮胎移动都带着‘数据’。”在南京锦湖轮胎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廖进荣介绍，传统自动化依靠人为控制、分段控制，现在可以通过数据库，以软件这个“大脑”控制整个生产流程。

中国电科十四所所长胡明春介绍，他们不仅自主研发了智慧企业整体解决方案，还牵头制定了部分行业标准，自主开发了工业软件、智能装备。

据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介绍，江苏已累计创建 536 个省级示范智能车间，通过示范引领有效带动全省相关企业推进智能制造，不断增强江苏工业经济竞争力。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技术改造处处长周土法说，“智能制造”实质上是推动企业向机械化、信息化方向发展，提升生产技术工艺。实施 5 年来，浙江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51.2%。

2 结构优化收入提高

记者采访地方政府和企业了解到，实施“智能制造”是为解决劳动力紧缺问题，企业用工需求仍然旺盛，就业规模整体保持稳定。

“智能制造”在缓解企业用工难的同时，也促进了岗位的新旧交替，提升了工人的收入水平。“从总体上看，企业对员工的需求基本平稳，但人员需求结构将发生巨大变化。”江苏省昆山市人社局局长朱天舒说，随着“智能制造”进程深入，当地原本占比较低的信息管理、软件开发等专业人才需求不断上升，特别是复合型技能人才成为制造企业的香饽饽，高薪难求。

昆山对当地“智能制造”企业用工需求影响进行的专项调查显示，实施“智能制造”后，一线操作人员平均减少 19%左右，企业对技能技术人员需求平均增加 18%左右，工程研发人员平均增长 9%左右。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沈彬说，“智能制造”的方向不是简单地用机器去取代人，而是用机器辅助人。实施“智能制造”后，制造业主要减少的工作将是技术密集度低的简单体力劳动，即普工工种，同时也会增加就业，主要是高端技术和技能岗位。

周土法说，智能化生产线和信息化生产管理系统，对生产工人的技术水平、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制造业高技术人才需求大增，技工技师和自动化、信息化专业人才逐渐成为企业招工的主要方向，有效促进了全社会劳动力结构优化和人均收入的提高。“这使一线工人离开了高危险、高污染、重体力的劳动岗位，转而从事辅助、监测、控制、检修等安全、健康、舒适的工作，也充分体现了先进生产方式带来的人文关怀。”

这一方案也催生了一些智能装备制造服务行业的就业机会。浙江省培育了 80 家省级“智能制造”企业工程服务公司，为中小企业“智能制造”做第三方服务，不仅是买了新的生产线要使用保养，更多是帮助企业把原有的设备提升改造。浙江力太科技有限公司 2013 年底公司员工只有 20 余人，现在员工已达到 380 人，到今年底将进一步扩展到 500 人规模。

近日，江苏省科技厅立项建设两个重大科技公共服务平台——江苏省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应用技术公共服务平台、江苏省人工智能产业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这是江苏省重点瞄准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需求，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领域布局建设的重大科技公共服务平台。以后者为例，

将建立高性能计算机服务平台，打造公共数据服务平台等，开展技术成果转移转化，为企业提供技术开发、产品开发、工艺开发、技术咨询等服务。

此外，记者调研中发现，不少企业并没有把“智能制造”后的富余用工推向社会，而是通过内部再培训再上岗就业。张雪健说，西奥有专门针对员工培训的机构西奥大学，那些从生产一线被替代下来的工人，在西奥大学经过3到6个月的培训，可以纳入维修保养人员的队伍，也可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回到家乡所在地的城市工作。

3 未来面临三大挑战

综合地方政府和受访企业反映的情况，“智能制造”顺利开展主要面临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和挑战。

一是实施成本较高、资金回收周期长，有待加强支持力度。

何晓峰介绍，新昌被调查企业中，约有70.8%的企业认为当前开展“智能制造”首要问题是成本太高，主要缘于两个方面原因：一是投入资金大，利息支出高。据对已经完成“智能制造”改造企业的调查，有超过1/5的企业投资额在500万元以上，这对中小企业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投资，加之近年来企业融资成本持续上升，增加了企业负担。二是资金投入回收周期长。调查显示，已经完成“智能制造”改造企业中，回收期在4年以上的企业比重高达42.3%。

他认为，“智能制造”作为一项推进企业升级的长期性工作，需要有较大的财政政策作为支撑。建议在整合现有的鼓励技术改造、淘汰落后产能、技术创新等补助资金的基础上，再追加产业扶持资金，统筹形成推进“智能制造”扶持资金。

沈彬表示，当前“AI应用”也是个热门话题。要看到，AI也从供给侧创造新的岗位。同时，“智能制造”本身是有一个极限的，成本收益是很重要的一个考量。

周土法建议，需要进一步细化完善“智能制造”政策体系。在现有政策基础上，允许企业在享受机器人购置奖励的同时，仍可享受其他项目扶持政策，拓宽“智能制造”企业融资渠道，协调银监部门建立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客户名录，加大对“智能制造”项目的融资保障。

二是进口设备依赖度较高，服务体系尚不完善。在10月中旬于南京举行的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上，与会人士分析，我国关键技术装备和工业软件还存在短板，高档数控机床、底层操作系统等还大多依赖进口；智能制造应用推广总体还处于自动化向数字化过渡阶段，协同推进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

常州五洋纺机公司董事长王敏其等企业界人士认为，不少企业的数字工厂基本都是进口设备，智能加工装备决定产品的档次，装备差距可能造成最终产品降低一到两个等级，品质不够就达不到提高竞争力的目的。

在需要开展“智能制造”的企业中，很大一批企业拥有国际先进的单机设备，还需要自动控制、自动检测、自动装配、自动传输等某个环节的专用设备，但很少有智能装备制造服务企业能够针对不同行业和企业的特点，提供差异化的设备服务。

走向智能研究院执行院长赵敏表示，“智能制造”是未来制造业的必经之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瓶颈在于，工业互联网软件领域基本都被国外把控。

三是高端人才短缺，企业培训压力大。多位专家判断，中国的智能制造仍处于起步阶段，不少企业还在进行数字化“补课”。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名誉主任朱森第认为，智能制造目前还处于大企业“唱戏”、中小微企业“围观”的状态，而中小企业智能转型是推进智能制造的重点和难点所在。

记者调研了解到，尽管多数企业有发展智能制造的意愿，但不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碍于高端人才缺乏等因素，无力或无法实施智能制造。李金鹏说，公司实施“智能制造”后，需要一批懂生产管理的网络工程师，但很少有高校培养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只好派出公司员工到第三方服务公司去学习物联网、智能制造等方面的知识。还有企业反映，公司的数字工厂需要派人去国外学习操作技术，但每年都会遇到人员流失问题。

一些企业已经在寻找对策。苏州博世公司成立学徒培训中心，主要开展机械、材料、电子等三大类专业培训，未来还将增加偏软件类的计算机、传感器等课程。公司有 6000 名一线员工，但只有 800 多名有一定“智造”基础的技术人员。“未来培训压力非常大。”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苏州市人社局局长朱正等人建议，相关部门未雨绸缪，加强对人工智能等课题的研究，引导职业院校和企业加强校企合作，在专业体系、课程设置、技术研究、人才培养培训等方面主动适应变化，打造新的劳动者队伍。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 未来就业》报告，未来 5 年，尽管 7500 万份工作将被机器取代，但 1.33 亿份新工作将同步产生，这意味着，净增的新工作岗位多达 5800 万份。

专家认为，人工智能将重新规划机器与人类的分工，倒逼就业结构深度调整。从低价值劳动密集型生产向价值更高的岗位转移；从重复性劳动向创造性劳动转移，产业工人可提前做好转型准备。不过，不必让机器换人的焦虑感造成“人机对立”。随着生产工具的改变，职业结构的调整是必然趋势，但并不会“一棍子打死”。

作者：黄筱 陈刚 周蕊（记者）/杭州报道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18-11

进博会中以合作篇：国术科技与 Eyeclick 公司推进融合发展

中国经济导报讯 记者张洽棠报道 11 月 5~10 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行。国术科技作为北京代表团企业参加了此次博览会，并在北京代表团签约仪式上，和以色列 Eyeclick 公司签订了进一步深化合作的战略合作协议。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建立，为中国的中小企业开展对外合作营造了良好的合作氛围和政治环境，国术科技就是众多受益的企业之一。国术科技董事长袁国术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很高兴，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和我们的合作伙伴达成进一步深入合作的协议。根据协议，我们将进口以色列 Eyeclick 公司 5000 万美元软件。在进口的同时，我们也将成为以色列 Eyeclick 公司在全球的制造中心，我们生产集成的交互投影设备将出口到世界各地。另外我们将还在新产品的硬件、系统软件和游戏节目软件研发上加强合作。我们和以色列 Eyeclick 公司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发展局面”。

专程来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以色列 Eyeclick 公司首席执行官 Ariel Almos 对中以之间的合作充满信心，他对中国经济导报记者表示，“中国是一个具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发展非常快，也是一个

非常重视儿童教育的国家，儿童教育产品在中国会有非常广阔的市场，我们对中国非常有信心。Eyeclick 是交互投影产品的全球领导者，我们的产品和服务遍布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希望将好的产品和技术引入到中国，和我们中国的合作伙伴—国术科技一道推动他们在中国的推广和应用，让中国的孩子更加健康、快乐的成长。”

据了解，以色列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国家，也是全球知名的创新国度，在科技创新方面有人才、制度和经验上的先发优势。目前，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北京也正在创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国术科技作为北京市的高科技企业，通过和以色列 Eyeclick 合作，将中国的市场和先进制造优势与以色列的科技创新优势相结合，取得了丰富成果，为推动中国的创新发展和北京市的创新中心建设，也为“一带一路”沿线民营中小企业合作探出一条可循之路。

作者：张洽棠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2018-11

国有企业双重目标下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从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在过去的 40 年发展历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存在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地方。如，国有企业的性质论证贫乏、体制机制仍然不顺等。在新时期，追求政治社会责任和经济利润目标这一双重目标业已成为国有企业进行下一步改革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因而，国有企业要继续深化改革，就首先必须明确国有企业的性质与定位，根据国有企业的涉及领域及其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来对其进行必要的经营目标分类管理，有的放矢地确定其经营目标与考核指标，而发展混合所有制就成为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种理性选择，可以实现兼顾经济目标和政治社会责任。

1 国有企业的性质及其边界

不论什么经济理论，它只有能有效地解释真实世界，作为政策指导，能有效地增强经济实力，才是有用的理论。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和威廉姆森等对所有权有深入的研究。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又发展出两条研究主线：一条是研究完全契约（complete contract）条件下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主要是指“委托-代理”理论；另一条是研究不完全契约（incomplete contract）下的激励问题，主要代表有哈特等提出的剩余控制权理论，以及威廉姆森提出的交易成本经济学，这些都是隐含在私有企业之中的。在任何社会制度下，都存在一些由政府拥有和控制的企业，我们将这类企业称为“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国家或政府的企业”，这是不同社会制度下国有企业的共性。当然，不同社会制度下国有企业的组织结构、经营目标、经济和社会作用等又存在一些重大差异，这是不同社会制度下国有企业的个性问题。

全民所有制在理论上指财产归全体人民所有，如果假设全民所有制这一根本前提不变，那么建立某种代理机构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能够对全民所有制进行操作并且帮助其生存的不二选择了。而全民所有制代理机构之所以存在，就在于国家这个超级代理机构的存在。只要国家存在，那么其必然要代表社会全体。因而其自身作为人民代表的资格或权利毫无疑问是具有垄断性的。因此，国家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是天然地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国家所有权必然与国家立法机构、政府机构，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发生关系。因而简单地将国家、政府或国有资本，拥有或控制的企业定义为国有企业，是从产权角度讲的。假设所有企业都采取股份制形式，依照国有资本拥有企业股权比例的比重，可将企业划分为私人企业、国有参股企业、国有相对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以及国有独资企业。在国家参股企业中，国有资本股份往往起到对企业的某种融资支持或监督作用，更有一类特殊的国家参股企业或称“黄金股”企业，国有资本以其掌握的特殊权利“黄金股”对企业经营进行特定的监管。国有相对控股企业的特点是国有资本拥有少于 50% 的股权但仍是企业最大化股东。在这类企业中，国有资本拥有实际控制权但不是绝对控制权。而在国家参股企业中，国有资本已经不再是企业最大股东，但可能是重要股东之一，甚至可能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在国有控股企业或称为国有绝对控股企业中，国有资本股东掌握着超过半数的企业股权。在国有独资企业中，国有资本股东掌握 100% 的企业股权。在这两种企业中，国有资本股东都能够保证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可以称为“标准的国有企业”。

简言之，国有企业就是国家或者政府企业，它具有一般企业的共性，同时又具有它的特殊性，这表现在它的国有性质上。这个定义虽然简单，但却非常重要。国有企业改革许多理论纷争本质上

都与没有正确认识“国有企业是国家或政府拥有或控制的企业”有关，是国家所有权（state ownership）的具体体现，与私有产权（private ownership）截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理论的研究核心无非是两个问题：第一，国家或政府为什么要建立国有企业？第二，国家或政府如何治理国有企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国有出资人可以作为股东，而政府可以作为监管者和财政管理者。实际上，不少国有企业改革论都否定国有企业承担一定政治社会责任的合理性，而现实中国有企业实实在在是在承载着这些责任，这就是其特殊性之所在。由此，国有企业既要像所有企业那样追逐利润，即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经济目标，又要实现一定的政治社会责任。

2 国有企业双重目标的不可分割性

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一个重要区别便是产权形式不同，国有企业是国家或政府拥有一定所有权。因此，国有企业分类区别于一般私有企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考虑国有企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责任的双重性。国有企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责任在某些情况下是一致的，这类国有企业主要是在保障产业安全、发展战略产业、促进人民充分就业等方面，在较好地实现经济目标的同时，也就可以更好地实现政治社会责任，为社会谋福利。但是同样存在的情况是，国有企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责任不一致问题，如要实现政治社会责任目标就会降低利润水平等。这类国有企业通常存在于基础产业、公用事业等外部性和自然垄断行业，承担着宏观调控、公共产品供给等任务。

2.1 首先讨论国有企业双重目标的必然性。

产权属于国家和全体人民是国有企业与一般企业的本质差别所在，其必然决定了国有企业的使命就不能简单地像私营企业那样去追逐利润至上这一单纯的经济目标。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国有企业只是执政政府用来弥补市场失灵的一种有效手段与机制，其可以节约政府的交易成本。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国家及政府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国有企业必须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肩负特定的使命职责，从而有效实现其政治社会责任。因此，这也是我国国有企业区别于私有企业的主要特征之一。

国有企业不仅要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追逐利润这一经济目标，还要根据政府及国家的大政方针战略来实现其政治社会责任，从而能够更好地实现政府和国家的意识形态诉求。作为全体人民的代理者，国有企业理所当然地要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因此也就有了国有企业经营目标的双重性，即追逐经济目标，并同时兼顾政治社会责任。诸如调节财富分配及社会成员收入、促进人民充分就业、维护商品价格稳定等政治社会责任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其能够充分展示公共利益上的公平性目标；而与之相对应的经济目标，就是保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2.2 其次来看国有企业双重目标的冲突性。

国有企业一边要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经济目标，努力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另一边又要作为公共利益维护者这一角色去实现整体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即实现政治社会责任。因而，此种情形之下，如果不能深入推进改革，不能建立有效的体制机制，国有企业就有可能走向竞争的反方向，特别是提升进入壁垒获取垄断租金，从而降低国有企业效率。

事实上，“诺思悖论”的确是存在于国有企业双重目标之中的。首先，国有企业明确要追逐企业利润和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包括对重要领域，关键行业和资源支配的控制等）；其次，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也是作为公共利益维护者的政府需要实现的另一个目标。这些社会福利包括国有企业的产品定价不能过高、几乎不能实施产品价格歧视、保就业多冗员导致的低效率等。此种情形毫无疑问造成了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削弱。以上两种相互冲突、相互作用的国有企业的目标导致可能出现如下局面：在追逐利润最大化这一经济目标指引下，国有企业不但享有很强的市场势力，而且还

人为设置进入壁垒，凭借垄断势力获取租金最大化；而在社会福利目标最大化的引领下，国有企业同时又要受到政府行政干预的钳制，以免其利用垄断地位侵害消费者的利益。因此，伴随着政府的行政干预，国有企业就要在这两个目标之间进行相应的选择，而其取舍的结果往往是倾向于政府的偏好。在公共利益与垄断租金这两者之中，两者的角色更替会影响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与演变。

2.3 第三，国有企业双重目标冲突的化解

实际上，在政府作出公共决策应该如何运行的问题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同样需要理性分析。换句话说，政府应该在某种政策好处明显大于害处时才会实施它。同理，当政府的边际产量已经达到了负数，足以说明其运行规模过于庞大了，那么就需要政府缩减行政开销，精简机构。对于国有企业所处的不同行业，也应不同对待。

以某些自然垄断行业为例，该行业的国企由于其资产专用性很强，在企业建立初期的资金投入巨大，根据边际成本定价的话，该企业将永远无法收回成本，即企业将长期面临亏损的局面。但是如果该企业想继续经营下去，势必要得到政府补贴。因而，此时的政府一定会对该类国企进行一定程度的价格管制，目的是真正体现国有企业政治社会责任的一致性。由此可见，国有企业一方面要维护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因其垄断地位又很容易侵害消费者利益。国有企业的这种“诺思悖论”，正是新时代国有企业双重目标下改革的重点，从而需要采取相应的制度安排，而其中发展混合所有制就是一种理性选择，从而可以化解双重目标之间的冲突。

3 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理性选择

如前所述，如果国有企业改革根据委托-代理这种完全契约理论来设计，那么就很容易设计出最优报酬结构。然而，由于设计契约是昂贵的，很容易造成契约不完全。因此，当契约所没有涵盖的情况出现时，问题就会出现，从而造成各种重新谈判问题，进而研究最优治理结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承认国有企业可以弥补市场失灵，但没有进一步解释这样的问题：政府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可以采用很多政策工具，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会选择国有企业这种直接干预形式？例如，对于某些公共产品和服务，既可以采取公私合作制（PPP）的方式，也可以采取政府管制私有企业经营模式，那么为什么要直接采取国有企业方式？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无法发现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在制度安排上的差异，无法解释国有企业相对于其他政策工具有哪些比较优势，从而无法回答上述问题，也就无法解释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要真正理解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就需要走进不完全契约世界里。其中，交易成本经济学和剩余控制权理论是基于不完全契约的企业理论。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里，由于有限的认知能力，在签订契约时无法预测到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因此，契约是不完全，会产生事后再谈判，企业剩余控制权十分重要。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很容易发现，国有企业的最优化与私有企业完全不同。私有企业的最优化可简单视为追逐利润价值最大化，但是国有企业的最优化不仅仅涉及此类经济目标，还涉及国有企业承担的政治社会责任，这使国有企业最优化问题更为复杂。

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中，其目标函数是随着社会、政治及经济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演变。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企业完全没有独立自主决定权，因而其为整个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也仅仅是按照国家行政指令来进行的。所以，可以说那时期的国有企业根本没有追求经济目标，仅仅是在执行政府的指令而去实现其政治社会责任而已；与之相对应，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诉求以及我国政府的不断放权让利，国有企业的利益经济目标才逐渐被重视起来。其结果是，虽然此时其原来的政治社会责任依然存在，但是已经被淡化了。尽管如此，这一目标的存在致使国有企业仍然背负着政治性和社会性任务，无法全力以赴致力于市场竞争。

3.1 一是国有企业的性质使国家所有权难以改变

股权结构是现代公司改革的基础，对公司改革的进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已经基本上完成了，股权已经被分散了，相互制衡的现代企业制度在形式上已经被建立起来了。但事实上，国有股份在国有企业中的比重仍占有绝对优势。追根溯源，国有企业的双重目标决定了这一现状。首先，追求经济利润目标一直是国有企业的诉求，所以如果允许民营资本参股过大势必会影响租金最大化；其次，为维持国企的本质特征，政府势必不会允许国有股份在市场上完全自由流通。这就致使其他投资主体没有进入的机会，从而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企业内部监督机制难以实现，有效的制衡机制就难以在国企之中形成。

3.2 二是企业内部改革还需进一步深化

国有企业的政治社会责任和利润目标完全是由政府来进行控制的。由此可见，不管是经济利润目标还是政治社会责任，国企都会或多或少受到政府行政的干预。政企分开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卓有成效的企业内部改革也要进一步深化。

3.3 三是国有企业双重目标使代理人目标多元化

改革的恰到好处是要尽量减少因为两权分离而导致的代理成本的攀升。我国国有企业自身复杂的委托-代理链条无形中增加了监管的难度，而代理成本也随之增加，再加之约束与激励机制并不完善，因而我国的国有企业高级管理者们并不是时刻都全力以赴地为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改革的难题就是促使委托人与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保持高度一致性。但是当下现状，使得代理人的目标更加趋向多元化，甚至出现控股股东侵蚀少数股东利益的委托人-委托人问题。不管代理者实际运营的效果如何，其总会找到诸如实现经济利润目标最大化、提高销售量、实现职工福利最大化等企业经营目标多元化的借口，因而对国有企业的业绩考核就变得十分困难。

面对上述情况，既然国有企业不同于私人企业，那么如何兼顾国有企业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社会责任？显然，发展混合所有制就成为双重目标约束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

由于国有企业在目标和权力方面不同于标准的私有企业的持股主体，所以对政府股东行为的分析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问题。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标应该就让所有的国有企业在各自的领域内真正成为既具备较高的经济效率，又有较好的政策执行力，因而在公司治理结构上发展混合所有制，可以化解国有企业双重目标冲突，从而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

4 一般性结论及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新思路

综上所述，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地位及性质，对其进行的改革绝对不能照搬私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正确审视国有企业的双重目标，更要正确对待二者之间的冲突，简单概括就是国有企业的政治社会责任同其经济利益目标之间的问题。而要解决该问题，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就成为一种理性选择的制度安排。

在这种情况下，私有企业、国有企业，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之间就会在市场上展开相互竞争。那么对于它们的表述要非常明确、政府所要承担的作用也要明晰，进而再根据发展阶段和历史特点而采用多种多样的控股模式。不论短期看来，还是长期看来，混合所有制的比例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状况而不断变化着。因此，破解国有企业改革困境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国有企业双重目标冲突最小化，并根据市场上的竞争程度和所属的行业对所有的国企进行相应的分类，目的是要在双重目标冲突的态势下，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具体来说：

4.1 首先，要从认知层面上确立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因而改革思路也应有所不同。

如果使用控制权配置的方式来实施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其改革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并且可以更进一步借助于法律规则来明确国有出资人在国企的治理过程中到底应该介入到何种程度。事实上，在国企的治理过程中，有选择地进行干预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不能照搬私有企业改革的激励结构，因为其公司治理过程并不是一个连续的环节，因此需要设计一个更加合理的治理形式。所以，需要从国家所有权角度开启一个动态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研究，特别需要考虑国家所有权与私有所有权对企业治理结构的不同影响，平衡发展好国有企业功能、政府的作用以及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三者之间的关系。

4.2 其次，明确不同行业国有企业的运营目标，完善其分类改革与治理，降低代理成本

众所周知的是，导致国有企业改革艰难的根本原因是其双重性目标的存在，所以就需对症下药地在其利润目标和社会责任之间寻求突破点，对其进行分类改革，力求缩小两个目标之间的冲突。对于那些公司主要业务已经进入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建议充分实施公司股份制度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引导其他各类私有资本或者国有资本加入以便帮助其实现股权多元化。在此过程中，国有出资可以参股、或者相对控股、或者绝对控股，目标是要大力推动其整体上市，即此时应该是经济目标为主，社会目标为辅。对于那些主业涉及国民经济命脉、国家安全领域与行业的国有企业，可以在保持国有出资控股的前提下，鼓励私有资本进入，谨慎发展混合所有制。对于那些完全公益性的国有企业来说，其目标主要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保障民生，所以可以考虑引入市场机制、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效率、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该类企业根据已有的不同条件，可以采用国有独资，投资主体多元化，特许经营、购买服务等灵活多变的经营形式。

4.3 第三，完善市场竞争环境，提高国有企业竞争力，界定国有企业功能和边界

生产要素市场机制建设不到位、市场化改革不完善，这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主要特征。因此，许多类型的使用价值需要由国家提供。一旦出于交换价值考虑，就会不顾后果地追求交换价值，许多人丧失了取得并持续拥有使用价值的能力，这对管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冲突的方式特别有意义。因此，国有企业需要政府大有作为，但这种有所作为不仅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还要把工作重心放到如何培育公平、公正、完善的市场竞争环境上来，其中完善外部市场竞争环境，发展混合所有制是其重中之重。由于国有企业运行也会有失灵的可能，因此需要加强反垄断管制、大力倡导发展混合所有制，加快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真正提高其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活力及控制力。

4.4 第四，界定好政府的多重角色，取缔种类繁多的行政垄断

需要厘清政府在国有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与任务，其前提是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改革。不管是作为股东，还是作为监管者和财政管理者，力争形成新的契约关系。例如，国有企业垄断的结果，不仅导致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出现，也可能会出现行政垄断问题，无法形成竞争中性环境。因此，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前提下，破除行政垄断，消除国家所有权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实现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

总之，在不完全契约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存在具有客观前提，其自身性质决定双重目标的内在冲突。为了化解这一冲突，积极发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是一种理性选择的制度安排，从而与政府外部管制、PPP模式等形成一种内部管制模式，丰富了市场经济体制内涵。而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关键因素在于健全国有企业现代制度，其包括完善归属清晰、流转顺畅、权责明确、保护严格等环节。大规模降低交易成本的途径之一，就是将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与公有制经济财产权界定清晰，在分类改革的基础上，使各种所有制产权依照法律平等利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样受司法保护等权利得到保障。这样的制度安排可以降低国有企业自身双重目标冲突所造成的问题，不断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相融合。因此，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成为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一种理性选择方案，对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经济发展策略转变：宏观到微观

各国纷纷调整内外策略，对内，要巩固经济复苏成果，不能长期依靠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而必须将着力点从宏观转向微观，发挥微观经济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迫切需要寻求优化营商环境之道。

对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是要在宏观经济政策架构的支撑下，培育内生式发展机制，与宏观经济政策形成双框架共同发力，必将抵御住更大的风险，支撑起更高质量的发展。

当下必须优化营商环境，让微观经济主体发展壮大，以夯实基础，保证经济稳定运行在合理区间，并保证各项改革取得预期成果。

2018年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十周年，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形势正在发生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给各国带来的重创并不能短期平复，目前仍留有经济低增长、利率低水平、债务和赤字规模巨大等“后遗症”，财政、货币等经济政策的空间已被压缩到最小，宏观经济和财政运行均具有较高的脆弱性。因此，各国纷纷调整内外策略，对内，要巩固经济复苏成果，不能长期依靠扩张性的经济政策，而必须将着力点从宏观转向微观，发挥微观经济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迫切需要寻求优化营商环境之道。对外，要在新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在新一轮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中获取更大的权益，尽可能地争取外部资源。

当前正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发展最好的时期，受到当年金融海啸席卷的国家已经走出低谷，并开始着眼于未来。与此同时，也不得不正视，目前世界经济仍主要靠不断升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支撑。因此，当前各国必须做三件事：一是根治经济增长对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依赖，建立起内生式发展的新机制。二是恢复宏观经济政策的韧性，掌握好收紧节奏，拓展政策空间。三是加速推进结构性改革，巩固经济复苏成果。

1 经济策略从宏观到微观转换的大环境

1.1 基本状态判断：新老架构之间的调整与转换

十年来，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漩涡并形成了一种不可持续的相对平衡状态，如果将世界经济比喻成一座房子，现在支撑起房子的架构是受力已经接近极限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下一阵风雨来临之前，必须对架构进行加固。

1.2 可行性评估：架构转换中经济的承受能力

在架构转换之前，先要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加以评估。

目前，对世界经济发展状况最权威的判断与评估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之际，IMF发表了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认为目前正是一个全球国际关

系框架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与此同时，普遍下调了全球和国别（地区）的经济增长预测。

综合分析，IMF 做出这样的判断和评估，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第一，世界经济在贸易、制造业和投资领域的加速复苏遭遇瓶颈，这主要是近期美国实施的贸易政策导致。第二，世界经济的脆弱性显著增加。一是发达国家应对危机所使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正在退出，使得全球资金流动性收紧，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受到的资本外流等影响；二是发达国家在收紧货币政策的同时，进一步放松财政政策，以对冲货币政策收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事实上是顺周期操作，其中蕴含着对自身和世界经济的巨大风险。

1.3 内在联动性分析：新老架构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构造

新老架构转换即便可行，但仍需慎重，需要全面了解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从源头梳理可知，为了应对危机各国最大限度地放松货币政策，为市场注入大量的流动性，相应地融资成本也较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把握了这一时机，进行大规模债务融资。目前随着经济复苏，货币政策开始收紧，各国经济发展环境随之发生改变，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以美国加息为起点，一系列连锁反应随之产生。从美国自身来看，随着国内利率升高、美元升值，投资、消费、出口构成总需求的各部分均受到影响。从对外界的影响来看，加息导致市场流动性收缩，资本市场震荡，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资金迅速从这些国家流出，并大多流入利率高、币值升的美国，使得美债收益率曲线趋平，降低美国收紧货币政策的效果，这可能阻碍美国经济增长进程，甚至重新走入衰退。

其次，贸易领域的紧张空气正向外扩散。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对这些国家出口有利，而美元升值对美国出口不利，最终造成贸易保护主义大行其道。由于国际贸易是全球价值链的载体，贸易保护主义破坏了全球价值链，会对投资、制造业发展、创新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

最后，架构转换的落脚点是促进微观经济发展。宏观经济增长的最强有力的支撑实际是微观经济发展，而促进微观经济发展是内生式发展的核心要义，所以，将内生式发展机制作为经济增长新架构的坚固性远远高于宏观经济政策。要促进微观经济发展，需提高生产率和就业水平，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微观经济主体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既要破除垄断、鼓励创新，又要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在此前提下，需要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借力，政策着力点从宏观转向微观，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成为营商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4 发展需求分析：形成合力

国际金融危机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危机，走出危机是各国政策协调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目前巩固复苏成果、走向稳定增长仍需要各国目标一致和步调协调，从总体上谋划，避免单方面行动而造成满盘皆输的后果。以货币政策调整为例，在危机中，各国纷纷实行非常规货币政策，经历了资产负债表的大规模“扩表”，经济复苏后，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过程也是资产负债表“缩表”的过程，这一过程要持续多年。为避免类似美国加息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动荡，各国需公开自身的货币政策调整计划，给市场明确预期的基础上，加强沟通协调，把握好调整节奏和力度，即小幅渐进式调整。

2 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策略从宏观到微观转换的基础

从第三季度数据看，美国经济表现仍然突出，但增长势头已经放缓，欧洲经济进一步下滑，日本经济复苏进展缓慢，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外部风险。从国家和地区的面看，经济发展策略从宏观向微观的转变是必要且紧迫的。

2.1 美国经济增长趋缓，加息和贸易政策效果显现

美国经济在二季度展现出高增长、高就业的强劲扩张趋势，经济增速达 4.2%，通货膨胀压力较大，三季度增速回落至 3.5%，经济过热的隐忧有所平复但仍不能消除。中美贸易局势趋紧恶化了美国企业的营商环境。美国市场对中国商品具有刚性需求，美国加征的关税最终是由美国企业和消费者买单，打击本国投资、消费和就业。美国财政政策取向是内松外紧，然而，对外趋紧的部分并不能抵消对内放松的部分，导致出现了巨大的财政风险。由此可见，在美国架构转换的风险点较脆弱，风险较高。

2.2 欧洲经济增速逐季匀速下降，主要源于“内环境”不佳

2018 年欧元区经济增长逐季下降且不及预期。前三季度 GDP 同比增长率逐季下降 0.4 个百分点，目前已降至 1.7%，低于预期 0.1 个百分点。经济持续下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受自贸易保护主义以及能源、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外部因素影响外，主要受多方面内部不利因素影响。一是财政形势紧张。二是欧洲制造业的景气程度不断下滑。三是就业形势虽然改善但也存在结构性问题，德法等国家技术劳动力相对短缺正在制约着经济增长。四是货币政策收紧，对银行业和实体经济产生比例影响。除此之外，德国政局和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土耳其的货币危机，均是欧洲经济增长不利的内因。

2.3 日本经济呈不稳定复苏，下行压力与上行张力并存

继一季度的同比下滑 0.6%、环比下滑 0.2%，二季度同比增长 1.9%、环比增长 0.5%之后，三季度日本经济又出现了下行压力。但从长期看日本经济已具有复苏的内在张力。三季度日本核心 CPI 保持逐月增长 0.1 个百分点的态势，9 月升至 1%，但仍远低于 2% 的通胀目标。因此，日本也开始了宏观政策由松到紧的调整期。政策由松到紧的调整必然会减缓经济增长步伐，迫于内外形势压力日本的架构转换只能走缓慢调整之路。

2.4 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陷入困境，外部冲击与内部脆弱叠加

三季度，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较大的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风险。货币贬值对这些国家经济的冲击巨大。在资本外流方面，国际金融协会（IIF）的监测显示，自 2016 年第四季度以来 2018 年第三季度新兴市场资金首次净流出。

为了降低发达国家收紧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外部冲击，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收紧宏观经济政策，以减少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的损失。然而，这些措施均是紧缩性经济政策，带来的结果将是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而对于已经出现负增长的国家来说，结果将是经济加速下滑。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仍较高，基础较好，应把握时机尽快推动架构转换，将经济政策着力点由宏观转至微观。

3 优化营商环境：经济策略从宏观到微观转换的必然要求

从当前现状来看，由于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发达国家更注重把原有的宏观经济政策搭建的架构撤下来，而没有意识到在撤的同时还要把新的内生式发展机制架构搭起来。而新兴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外部冲击，更加注重从内到外的加固，并且与发达国家的宽松宏观经济政策已用到极限不同，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还有空间，这恰是危机十年这些国家获得的新的发展机会。对于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是要在宏观经济政策架构的支撑下，培育内生式发展机制，与宏观经济政策形成双框架共同发力，必将抵御住更大的风险，支撑起更高质量的发展。

内生式发展机制的核心是推动微观经济主体的发展。因为微观经济主体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企业成长带来投资繁荣，并推动供给增加；自然人的发展带来消费扩张并引致投资扩大，并带动需求增加——从而实现宏观与微观经济的相互促进、良性发展。中国正处于这种形势之

中。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步入经济新常态，要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稳定经济增长，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撑。与此同时，还要应对贸易战等国家间的激烈竞争，在国际资源配置中维护国家权益并尽可能地争取主动。当下必须优化营商环境，让微观经济主体发展壮大，以夯实基础，保证经济稳定运行在合理区间，并保证各项改革取得预期成果。

作者： 闫坤、于树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来源：《经济参考报》2018-11

以长远视野统筹推进减税降费

大幅减税的同时实现税收收入高速增长。带来税收增长的原因主要有税基扩大、物价上涨和加强征管。

我国当前减税降费伴随严征管对冲的策略并不一定能确保实质性减轻企业负担，进一步减税降费的思路首先需转变策略，从侧重于推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优化营商环境。

需以全局和长远的视野，对减税降费政策给予统筹协调推进，最终将当前的减税-增收现象转变为拉弗曲线所预示的减税-增收良性循环。

在当前国际贸易摩擦升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发展面临困境的背景下，减轻企业负担进而保证宏观经济稳定是当务之急。我国需以全局和长远的视野，对减税降费政策给予统筹协调推进，最终将当前的减税-增收现象转变为拉弗曲线所预示的减税-增收良性循环。

1 我国营商环境改进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提高

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强化培训，促进改革》报告显示，中国是营商环境改善最显著的国家之一。营商环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保障，在营商环境的不断改进下，我国经济在总量和结构、供给和需求方面的发展质量正在稳步提高。

经济总量仍处于中高速增长区间，但下行压力加大。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650899 亿元，同比增长 6.7%，增速比上半年降低了 0.1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降低了 0.2 个百分点。从季度环比看，2018 年我国经济增速逐季回落，且回落速度有所加快。虽然总体水平仍然处于 6.7%-6.9% 的中高速增长区间，但下行压力值得警惕。

经济结构质量总体改善，地区结构现风险因素。当前，在我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的同时，我国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体现出以增长速度换取发展质量的成果。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均衡度在进一步提高，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指标部分下行。9 月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低于全国增速 1 个百分点，分别低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增速 2.2 个和 2.6 个百分点。由于东部经济占全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其增速放缓应视为经济结构中的风险因素而加以警惕。

需求增速回落，结构有所优化。从投资、消费、出口的主要统计数据来看，前三季度，我国需求“三驾马车”的增长速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也要看到存在结构优化的一面。内需占总需求中占据绝对地位，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109.8%，较去年提高 12.5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消费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78%，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13.5 个百分点，是资本形成总额贡献（31.8%）的两倍多，使得我国需求结构更加稳固。

2 我国财政运行与营商环境 优化要求之间尚存距离

1-9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5831亿元,同比增长8.7%,增幅较去年回落1个百分点;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9348亿元,同比增长28%,增幅较去年回落5.3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63289亿元,同比增长7.5%,增幅较去年回落3.9个百分点;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49728亿元,同比增长36.3%,增幅较去年提高4.9个百分点。但从财政运行特点看,目前我国财政运行与营商环境优化的要求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大幅减税的同时实现税收收入高速增长。从前三季度的财政数据来看,除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外,财政收支增速与去年相比普遍回落,但却以高于GDP的增速运行,且收入增速高于支出增速。在大规模减税降费的背景下,财政收入高于GDP和财政支出的速度增长,体现了政策宽松与效果趋紧之间的矛盾。由于非税收入同比下降10.9%,所以可以把费的因素排除掉,只有税收存在这样的情况。带来税收增长的原因主要有税基扩大、物价上涨和加强征管。税基扩大和物价上涨所引起的税收收入增长是内生性的增长,不会给微观经济主体带来难以承受的税感而恶化营商环境。但加强征管则不同,其所带来的税收增长是外生性的增长。由于我国原来税收征管体制不完善,税收征收率很低,存在着大规模的应缴未缴税款,随着征管体制以及数字化、信息化征管手段的不断完善,税收征管效率大幅提升,由加强征管带来的增收效应不可小觑。

财政收支对比关系有较大波动。自6月我国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支由盈余转为赤字后,近几个月财政赤字经历了缩减近一半再呈倍数扩张的过程。从增速来看,前三季度收入增速高于支出增速1.2个百分点,收入增长的势头仍强于支出,但二者差距在缩小,这是减税降费和加快支出进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的收支对比关系也有较大波动,且在8月之前收入增速高于支出增速,9月支出增速才反超收入。

观测月度累计数据,财政收支的对比关系跌宕起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增值税和进口关税税率下调等减税降费的政策性因素,也有某些突发性因素,还有支出进度加快的因素。当前我国财政收支结构失衡,财政支出规模波动性较大,且支出增速低于收入增速,那么财政收入超速增长的部分未能通过增加支出而得以全面疏导,存在“挤出效应”隐患,对扩大内需不利。

3 推动减税降费策略 向优化营商环境转变

在当前国际贸易摩擦升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发展面临困境的背景下,减轻企业负担进而保证宏观经济稳定是当务之急。但我国当前减税降费伴随严征管对冲的策略并不一定能确保实质性减轻企业负担,进一步减税降费的思路首先需转变策略,从侧重于推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优化营商环境。当前,这一转变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必要性,如果我国可以尽早认识这一点,并能够主动作为,可以充分发挥优势,获得最大的政策福利。

3.1 调整减税降费政策目标:从稳增长为主到降成本为主

前三季度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情况表明,把减税降费的着眼点放在宏观并不能确保稳增长,应该尽快将着眼点从宏观转向微观,夯实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针对每个结构性问题加以解决,唯有如此,才能改善营商环境,让企业轻装上阵,创造更多的利润。事实证明,针对微观主体实施的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间接影响是巨大的。为此,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保持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税率及社保费率降低的既定方向,推动进一步的减税降费措施加快落地;其次,增强减税降费的针对性,在了解企业税费成本构成的基础上,针对企业负担最重的税费成本,寻求降低的办法,进一步提高减税降费的政策效果。再次,每项财税政策出台前,均分行业、分企业类型测算对企业负担的增减影响,避免出现普遍增税效应。最后,增强减税降费的整体性,考虑减税降费政策与金融、产业、区域等政策的协调配合,打出力度最大的“组合拳”,同时,还要以

绩效预算的要求对其加以约束。

3.2 提高政策对冲能力：找准方向、把握力度

目前为政策作对冲安排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这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运用能力提升的表现，能够有效防止因实施宏观经济政策而对经济造成的大起大落，但对冲策略运用得当与否也与政府施策能力密切相关。

在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后，“对冲”已经成为促进稳增长的财政政策所采用的通行策略。采取对冲策略的初衷是求稳，缓释减税降费带来的短期财政风险，值得肯定，但如果对冲力度过大，让企业税费负担不降反升，同时让积极财政政策产生了紧缩效应，就过犹不及了。因此需要提高对冲能力：一是找准方向，二是把握力度。

3.3 通过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以社保征收机构改革为例

根据上述建议，我们可以社保征收机构改革为例，探索减税降费的策略转化，进而优化营商环境的路径。

首先，减轻企业社保费负担应作为进一步减税降费的重中之重。据白重恩测算，我国社保缴费占企业盈利的49%，既超过美国10%的水平，也超过瑞典35%的水平。因此，降低企业社保负担能够显著提高减税降费的针对性。

其次，需要从费率、基数、征管角度全方位降低企业社保费负担。一是降低社保费率。目前，我国社保实际缴费率显著低于名义缴费率，仅养老保险实际缴费率与名义缴费率就差10-13个百分点。社保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名义费率与实际费率合一。由于改革以降成本为宗旨，应就低不就高，建议降低10-15个百分点，即将社保费率降至25%-30%，其中企业养老保险费率降至14%。二是改变基数确定办法。由于税务部门准确掌握企业工资发放情况，基数确定依据可以从社会平均工资转为职工工资，并综合考虑行业、企业类型、工资自然增长率等各方因素，通过精确测算确定基数上下限以及与工资增长之间的关系。三是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征管策略。对于因制度软约束造成的“漏缴”绝对不可追缴，对于恶意逃费损害职工权益的情况，应该追缴。在此前提下，待社保征管机构改革全面到位后，须从严征管，但对小微企业、新设立企业可给予一定优惠照顾，待其具有成长性、盈利能力足以担负起正常的社保缴费后，优惠政策当适时退出。

再次，设定适当的对冲缓释安排。我们认为，对冲策略应是设置4-8年过渡期，将降低费率与征收体制改革同步实施。根据我国目前社保费率降低的节奏，社保费率3年降低3.75个百分点，每年降低1.25个百分点，以此节奏，降低10个百分点需设置8年过渡期。如果速度提升1倍，每年降低2.5个百分点，则需设置4年过渡期。那么，征收体制改革需与降低费率保持同步，即4-8年到位，根据这一时间表，充分考虑经济增长情况和对冲策略的预期效果，对改革任务进行具体规划。

最后，统筹考虑社保征收机构改革与其他减税降费政策的协调配合。目前，社保缴费作为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可免征个人所得税，同时作为企业所得税的成本扣除项可减少企业所得税。此外，增值税税率下调改革也对企业负担做减法。

作者： 闫坤、于树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来源：《经济参考报》2018-11

9 万亿美元！巨额企业债成为美国经济的定时炸弹

浪美股讯 北京时间 22 日消息，据 CNBC 报道，美国企业债规模已从 2007 年的 4.9 万亿美元激增至 2018 年中期的 9.1 万亿美元，飙升了 86%。

对美国经济来说，9 万亿美元的企业债就像是一枚准备引爆的定时炸弹，由于宽松的借款条件和投资者似乎永无止境的渴求，美国企业债务负担持续增加。

不过，华尔街对这个问题持乐观态度，认为至少未来一两年这个问题还是可控的。

对饱受创伤的金融市场来说，解决问题至关重要。股市正陷入困境，信贷利差正在消失，人们越来越担心巨额负债加上利息升高将开始对企业利润率产生重大影响。

从本质上讲，有两种方式可以打破这种局面：在好的情景假设下，随着经济企稳、利率继续受到控制，企业可以控制自身债务；在另一种情景下，经济放缓同时利率持续上升，债务很难再展期。

1 企业债几乎翻倍

过去十年，美国企业利用低利率发展业务并回馈股东。

根据美国证券业及金融市场协会的数据，美国企业的债务总额从 2007 年的近 4.9 万亿美元激增至 2018 年中期的 9.1 万亿美元，飙升 86%。

实际上，惠誉评级预计 2019 年的债券违约率将处于自 2013 年以来的最低点，杠杆贷款则处于自 2011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市场担心债务的原因之一是没有足够的现金来偿还债务。2017 年，企业借款者的现金/负债率降至 12%，创历史最低水平。

2 投资者依然愿意买

对于已发行的债券，尽管投资者需求开始有所减弱，但依然强劲。

穆迪报告称，其契约质量指标已连续 18 个月处于最低分类水平，仅略低于 2015 年 8 月创下的纪录水平。

同时，随着强势资产负债表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可能是一个麻烦信号。

从较低的投资级降至垃圾级是令市场恐慌的情况之一。就此而言，通用电气（GE）是最引人注目的公司，但公司管理人员坚称，他们正尽一切努力确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如果一家公司出现如此大的下滑，它将重塑高收益市场。投资者将被指望收购这些债券，但可能会要求更高的收益率。

3 杠杆贷款威胁

其他挑战之一来自杠杆贷款市场，这个增长领域目前的总发行量最高，为 1.3 万亿美元。

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最近的一次公开听证会上公开谈到了这一威胁。这位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参议院警告美联储负责银行业监管的副主席兰德尔·夸尔斯（Randal

Quarles) 说, 从十年前开始, 这种杠杆贷款对次级贷款构成了大规模的经济威胁。

凯投宏观 (CapitalEconomics) 全球经济学家西蒙·马拉卡姆 (Simon Macadam) 也表示, 杠杆贷款 (通常是发放给资产负债表上债务负担较大的低质量借款人) 构成了一种危险。

“主要担心的是贷款标准的下降,” Macadam 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说, “在美国, 没有要求借款人满足常规金融测试要求 (例如最高杠杆率和最低利率覆盖率) 的杠杆贷款比例, 已从 2007 年的大约四分之一上升到今天 80% 的创纪录高点。”

作者: 吴菁

来源: 新浪财经 2018-11

国际油价何处寻底?

纽约油价、布伦特油价已连跌七周, 较 10 月初创下的近四年高点分别重挫 34%、31.9%。上周末, 布伦特油价一年多来首次跌至每桶 60 美元下方。分析人士认为, 主要产油国原油产量超预期增长、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推动国际油价一路走低。

主要产油国原油产量超预期增长保证了国际原油市场的供给。彭博社消息称, 11 月沙特原油日产量接近 1100 万桶, 刷新其 10 月创下的日均 1065 万桶的历史新高。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也显示, 上周美国原油日产量仍维持在 1170 万桶的历史高位。俄罗斯原油日产量则连续数月保持在 1100 万桶之上。仅美国、俄罗斯、沙特三大产油国的原油产量, 便可满足约三分之一的全球原油需求。

此前, 为弥补伊朗因受美国制裁造成的潜在原油供应损失, 包括沙特、俄罗斯在内的许多产油国开足马力提高产量。11 月初美国对伊朗原油出口制裁“靴子落地”时, 制裁力度明显不及市场预期。国际能源署月度展望报告称, 自今年年中以来, 中东、俄罗斯、美国的原油增产超过了伊朗、委内瑞拉等国家。

美国能源信息署 21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全国商业原油库存连续第九周上涨, 目前库存量已至 4.469 亿桶, 创 2017 年 12 月以来新高。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全球原油市场已重回供大于求状态。

雪上加霜的是, 近期股市大幅调整又加剧了投资者对需求端的担忧。在美联储持续加息、美国减税效应逐步消退等因素影响下, 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情绪一直存在, 近期全球股市尤其是美国股市大调整, 进一步打击了投资者情绪。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和投资银行高盛都预计 2019 年全球经济将放缓, 美国经济也难独善其身。

国际原油市场供需不平衡已引起欧佩克及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的重视。这些国家将于 12 月 6 日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商讨减产, 而围绕此次会议的多空博弈, 为国际原油减产前景增加了不少变数。

投资银行 RBC Capital Markets 全球商品战略主管克罗夫特表示, 如果沙特在 12 月初会议上主张大幅减产可能会触怒美国。因此, 迫于美国的压力, 沙特不得不慎重抉择。

已是全球最大产油国之一的美国并不会参加任何减产协商。随着美国页岩油产量持续飙升，欧佩克及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的减产立场，也存在因担心失去国际市场而有松动的可能。

不过，总体而言，在电动汽车等新能源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之前，国际原油市场供需大致平衡的基础并未改变，国际油价大跌将刺激需求、抑制产量，预计未来国际原油市场供需将在油价震荡探底过程中逐步趋向平衡。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国际油价或已处在震荡寻底过程之中，在 12 月初维也纳能源会议消除一些不确定性后，国际油价将重新企稳。

作者：王乃水

来源：《经济参考报》2018-11

全球经济同步复苏进程遭遇阻力

2017 年，全球经济体经历了同步复苏，但是近来同步复苏进程已开始遭遇阻力，特别是主要经济体的复苏步伐不一，有些则出现减速现象。

今年一季度，经合组织预期，全球贸易的强劲增长将带动经济创下 7 年新高。然而，时隔半年，经合组织表示，全球经济增长或已见顶，11 月又下调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同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 1 月曾认为，进入 2018 年后，世界经济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 3.9%。而到了 10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认为，全球经济正在失去动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风险，转而将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重新下调至 3.7%。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际组织对全球经济的展望发生重要变化。

探寻经济预期转变的主要原因，担忧国际贸易摩擦全面升级是最重要的因素。世界贸易组织表示，今年 5 月中旬至 10 月中旬，G20 成员采用了 40 项新的贸易限制措施，涉及贸易额约 4810 亿美元，达到自 2012 年开始监测 G20 贸易以来的最高水平。加上货币政策收紧的影响，对未来经济增长预期的乐观程度降低。

摩根大通全球制造活动数据显示，10 月产出增速已降至 28 个月来的最低水平，同时出口订单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减少。市场数据供应商 IHS Markit 的数据显示，欧元区制造业 PMI 指数已经降至 65 个月新低。不过，由于各大经济体资源禀赋不同、增长驱动力不同，在增长回落时间、回落幅度上出现分化。

受财政刺激政策、强劲的商业和消费者信心等因素驱动，在未来数月，美国经济仍可能继续徘徊在经济扩张周期的峰值范围。目前来看，美国 11 月 Markit 制造业 PMI 初值为 55.4，表现稳健，第四季度依旧有望维持强劲的经济增速。但随着财政刺激效应衰减、货币政策环境趋紧等因素显现，明年美国经济增速预计将会回落。

而 11 月 14 日，日本内阁府的数据显示，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按年率换算下降 1.2%，继一季度经济下滑 0.6% 以来，再度出现负增长。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也同样出现经济波动，11 月中旬，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由于受外贸走势等因素影响，三季度 GDP 环比下降 0.2%。

未来欧洲和日本的发展形势也不容乐观。纵观今年前三个季度，日本经济已有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国际局势多变也影响到企业设备投资，经济复苏计划可能被打乱。由于全球贸易局势趋于紧

张，德国经济智库将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下调了两个百分点至 1%，加上英国“脱欧”可能造成的影响，德国经济增长预期已被下调，进而影响欧元区的整体表现。三季度，欧元区经济年化增长率仅为 0.7%，是自 2013 年初以来的最差表现，未来外贸可能再次对欧洲经济产生负向影响。而欧盟预计英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 1.3%，是自 2009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欧洲央行如果在 2018 年末结束量化宽松政策，2019 年欧洲经济前景并非十分乐观。

新兴经济体方面，尽管总体经济增长水平仍将高于发达经济体，但不同国家情况也存在明显差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仍处危机状态的委内瑞拉经济将连续五年下滑，今年可能负增长 18%；而土耳其明年经济增长预期仅为 0.4%。

目前看来，如果国际贸易摩擦能够缓和，明年全球经济仍有望保持较为强劲的增长势头。

作者：周武英

来源：《经济参考报》2018-11

协议获欧盟通过 英国“脱欧”仍存变数

欧盟 25 日召开特别峰会，通过与英国达成的“脱欧”协议。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这是欧盟和英国所能达成的“最好协议”，呼吁英国议会支持并通过协议。但一些分析人士指出，英国一些强硬派人士认为英方让步过多，这份协议可能无法在英国议会顺利通过，这意味着英国仍然存在“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

1 双方最终达成一致

多家媒体报道，除英国外的欧盟 27 个成员国领导人当天讨论并表决英国“脱欧”协议。协议获得各国领导人一致通过后，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加入会议，讨论“脱欧”下一步举措。

容克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写道，峰会通过了英国退出欧盟协议和“英欧未来关系宣言”。媒体报道称，英国退出欧盟协议大约 600 页，“关系宣言”26 页。英国“脱欧”协议由退出协议和“关系宣言”组成。前者就英国“脱欧”过渡期、公民权、爱尔兰边界等事项作出规范；后者着重定位英国退出欧洲共同市场和关税同盟后与欧盟的贸易和安全关系。

“脱欧”协议规定，英国明年 3 月正式“脱欧”后有 21 个月的过渡期，其间继续留在欧洲共同市场与关税同盟，享受贸易零关税待遇；英国需向欧盟支付总额大约 390 亿英镑的“分手费”，在过渡期需要向欧盟支付“年费”。协议强调，英欧将着眼于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份文件具有法律效力。

不少观点认为，这是英国与欧盟开始“脱欧”谈判一年多以来取得的重大成果，双方终于可以将“脱欧”事宜推向下一个重要程序。

不过，“脱欧”协议正式生效前，需要获得英国议会和欧盟其他成员国议会分别表决通过。容克在记者会上表示，“脱欧”协议是欧盟与英国所能达成的“最好协议”，相信英国政府将成功获得英国议会支持。他没有回答记者提问，即英国议会如果没有通过协议将发生什么。

荷兰是英国的最密切贸易伙伴之一。荷兰首相马克·吕特告诉记者，英国退出欧盟，“没有人赢，我们都输了”；但他认定，“脱欧”协议是“可以接受的妥协”。欧盟负责英国“脱欧”事务谈判的首席代表巴尼耶告诉记者：“从现在开始，所有人都应该承担责任，所有人。”

英国于 2016 年就“脱欧”问题举行全民公投，最终决定退出欧盟。2017 年 3 月 29 日，英国正式向欧盟递交“脱欧”信函，“脱欧”程序正式启动。根据英国与欧盟的协议，英国将在明年 3 月 29 日正式“脱欧”。

2 协议仍需闯关英国议会

英国“脱欧”协议将在年底前递交议会表决。英国与欧盟谈判过程中，特雷莎·梅在国内持续遭遇阻力。英国多个党派近来均表示反对这份协议，包括工党、社会民主党、苏格兰民族党等。英国《卫报》等不少媒体预计，“脱欧”协议将在议会遭到反对，不少议员认为英方让步过多。

保守党在议会下院单独掌握议席不到半数，依赖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联盟勉强维持微弱多数。保守党内的部分“疑欧派”人士，一直认为特雷莎·梅向欧盟妥协太多。草案遭遇保守党内多名主要成员反对。因不满草案而辞职的前“脱欧”事务大臣多米尼克·拉布 23 日说，他预期草案将在议会下院遭否决。

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目前对“脱欧”协议中有关爱尔兰边境问题的内容仍有异议。有观点认为，一旦该党在“脱欧”协议的议会表决中与保守党不一致，将导致协议在议会通过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根据“脱欧”协议，如果英国与欧洲在“脱欧”过渡期内无法协商出一份关于北爱尔兰地区贸易的更好方案，在过渡期结束时，将启动“备份安排”。一些批评人士认为，“备份安排”将让北爱尔兰地区受制于欧盟的贸易规则，从而在现实中将北爱尔兰“留在”欧盟。

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党首阿琳·福斯特曾表示，在表决中不会支持现有草案。福斯特表示，特雷莎·梅应确保北爱尔兰地区的“备份安排”不被启用。福斯特还呼吁政府为北爱尔兰地区协商出一份更好的方案。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政府就直布罗陀事宜作出让步也招致国内“脱欧”强硬派不满。为了给欧盟特别峰会扫清最后一道障碍，英国 24 日作出让步，同意西班牙在英国脱离欧洲联盟后就直布罗陀事宜拥有“特别否决权”。“脱欧”协议适用地域范围不包括直布罗陀；任何涉及直布罗陀经济领域的协议必须依据英国和西班牙双边协议。

3 “无协议脱欧”可能性仍存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5 日报道，保守党内一些大臣正在准备“脱欧”协议的替代方案，以防止议会否决现有协议。

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凯特在欧盟峰会通过“脱欧”协议后告诉记者，如果英国议会否决协议，可能出现四种情况：英国再次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脱欧”；英国举行选举替换首相；各方代表重新磋商英国“脱欧”协议；英国“无协议脱欧”，即“硬脱欧”。格里包斯凯特当天在“推特”写道，英国退出欧盟的过程“远未结束”。

保守党资深下院议员伯恩纳德·詹金说，一旦“脱欧”协议无法如首相所希望的那样在议会通过，将引发政治危机。“一旦政府无法确保‘脱欧’协议在议会下院初次投票时就通过，那就应该立即启动‘无协议脱欧’应急方案。”詹金认为，“脱欧”协议能否在议会通过，目前“十分难以预料”。

特雷莎·梅在一封公开信中呼吁英国民众支持“脱欧”协议。她此前曾多次表示，如果英国议会否决这份“脱欧”协议，将没有第二份协议。她坚称现有协议是“最佳方案”，继续与欧盟谈判不会有更好结果，“如果协议未获通过，我们将回到原点。那样，我们只会有更多不确定性、更大分歧”。

英国舆论担心，一旦英国“无协议脱欧”，英欧可能退回到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进行贸易，这

将让互为主要贸易伙伴的英欧贸易成本增加。

作者：王婧 桂涛 郑昊宁（记者）

来源：《经济参考报》2018-11

日本经济年末面临下行压力

据外媒报道，日本财务省 19 日发布的最新统计初值显示，10 月日本贸易收支为逆差 4493 亿日元。分析指出，原油价格上涨导致进口额增加，这使贸易收支两个月来首次呈现赤字，增加了日本经济年末的下行压力。

鉴于目前经济形势，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 19 日表示，2013 年以来执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推动日本经济实现反弹，央行有决心继续保持当前宽松政策。

1 油价上涨推升贸易逆差

有分析认为，国际原油价格 10 月保持相对高位，导致日本进口成本增加，这是其贸易出现逆差的主要原因。据共同社报道，当月，日本对中东原油、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和中国服装进口大幅增加，总额比去年同期增加 19.9%，达 7.6927 万亿日元。出口方面，汽车、发动机、半导体等电子零部件增长明显，带动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8.2% 至 7.2434 万亿日元。由于进口增幅远远高于出口增幅，最终日本 10 月贸易收支出现 4493 亿日元赤字。

从贸易对象国和地区来看，日本 10 月对美贸易收支是 5734 亿日元顺差，顺差额同比减少 11%，连续 4 个月出现减少。对欧盟是 731 亿日元逆差，对亚洲则是 2239 亿日元顺差。

不管是对美国、欧盟，还是对亚洲贸易，日本 10 月进口总额都创下历史同期最高水平。其中，从亚洲的进口额还是单月进口额的历史最高水平。

原油价格保持高位，贸易收支呈现赤字，已令日本经济承受下行压力。日本财务省此前发布的 2018 财年上半年国际收支数据显示，因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导致进口额增加，今年 4 至 9 月，日本经常项目盈余约为 10.65 万亿日元，同比减少 8.3%。数据显示，上半财年日本出口总额为 40.02 万亿日元，同比增加 6.5%。而因原油价格同比上涨约 40%，进口总额增加 11.5%，至 38.85 万亿日元。最终上半财年的贸易收支为 1.17 万亿日元顺差，较去年同期大幅下滑 57%。

2 多因素拖累日本经济

除国际原油价格高企外，还有一系列负面因素集中在三季度爆发，导致日本经济下滑趋势明显。根据日本内阁府本月中旬公布的今年三季度（7 月至 9 月）国内生产总值（GDP）初值显示，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后实际比上季度减少 0.3%，换算成年率为下滑 1.2%，时隔一个季度呈现负增长。

共同社指出，三季度实际 GDP 降幅创下 2015 年四季度以来高位，从内需和外需的贡献度来看，两者均造成了拖累。

日本 GDP 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今夏自然灾害频发导致内外需双双下降。内需方面，消费者因酷暑、暴雨等恶劣天气减少外出游玩和用餐次数。同时，灾害造成蔬菜减产，推高生鲜食品价格，影响消费者心理。受天气状况不佳影响，休闲及餐饮业陷入“苦战”。生鲜食品涨价也打击了消费者心理。三季度，日本个人消费环比下降 0.1%。

在外需方面，日本出口三季度环比减少 1.8%，时隔 4 个季度再次下降。除了面向亚洲的智能手机零部件等出口势头放缓外，今年第 21 号台风“飞燕”导致关西机场功能一度瘫痪，电子零部件等出货不畅。另外，日本西部地区暴雨导致工厂停工、设备交货延期，民间企业设备投资三季度下降 0.2%，为八个季度以来首降。

也有当地媒体指出，三季度负增长由自然灾害等因素造成，符合市场预期。灾区重建需求等因素有望支撑日本 GDP 在今年第四季度反弹。

目前，全球贸易摩擦呈现升级局势，日本也在密切关注这种局势对经济造成的下行风险。日本一直在积极推动与多方的贸易谈判，努力提振贸易表现。

尽管美国与日本之间存在贸易分歧，但美日贸易合作也一直在推进。美国副总统彭斯敦促日方进一步向美方开放市场，以调整双边贸易的“不平衡”。彭斯近期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说，美方很快将与日方启动“历史性”贸易谈判。美方敦促日本开放牛肉、大米等农产品市场，同时希望扩大对日本的汽车出口。

彭斯 10 月把美日打算谈判的贸易协定描述为“自由贸易协定”，而日方界定双方所谋求的是有限贸易协定。为避免美方对日本产汽车加征关税的威胁，日方最终同意与美方启动双边贸易协定谈判。只是，依日方设想，协定是主要涵盖货物贸易和部分服务贸易的有限贸易协定，并非美方最初提议的自贸协定。

据外媒报道，日本还积极推动和欧盟打造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双方的经济伙伴协定（EPA）有望于明年生效。欧盟和日本签署的协议将取消针对日产车的 10%关税，以及大部分汽车零件的 3%关税，日本也将取消对欧盟乳酪和葡萄酒分别征收的 30%和 15%关税，并允许欧盟在日本进行公开招标。此外，双方还承诺开放金融服务、电信、电子商务和交通等领域的服务市场。

3 日央行政策继续宽松

鉴于目前经济形势日益紧迫，日本央行已表示将维持超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 19 日表示，2013 年以来执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推动日本经济实现反弹，央行有决心继续保持当前宽松政策，日本央行的宽松政策将最终推动通胀率实现目标。

日本央行上月底举行货币政策决策会议，决定维持目前的大规模货币宽松政策不变，并下调了 2018 财年的实际 GDP 增速预期以及 2018 财年至 2020 财年的通胀预期。

日本央行在本次会议上决定，短期利率维持负 0.1%的水平；继续购买长期国债，以使长期利率维持在零左右运行。日本央行指出，将朝着实现 2%的物价稳定目标，通过长短期利率操作维持货币宽松。继续扩大基础货币，直到除去生鲜食品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稳超 2%。此外，日本央行将 2018 财年实际 GDP 增长率从此前预期的 1.5%下调至 1.4%，而 2019 财年和 2020 财年维持 0.8%的增长预期不变。

分析人士表示，通胀率是日本央行主要关注的经济指标，在目前通胀率只有 2%政策目标一半的情况下，预计该行未来资产购买将会继续。随着 2020 年东京奥运会带来的建筑热潮退却，日本国内需求将会放缓，这意味着日本央行仍面临着支撑经济的重任。

也有分析指出，仅靠日本央行推行超宽松货币政策，对日本经济来说“杯水车薪”，而且还会给日本带来更为沉重的债务负担。日本央行指出，截至 11 月 10 日，日本央行总资产达到 553.6 万亿日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6 月底的日本名义 GDP 为 552.8 万亿日元。

作者：王婧（记者）

来源：《经济参考报》2018-11

维护多边合作机制 提升对华合作水平

第 33 届东盟峰会及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 13 日将在新加坡正式开幕。峰会期间，东盟各成员国领导人将围绕“韧性与创新”主题，探索在日益增加的全球不确定因素及日新月异的技术冲击下，进一步推进东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谋求安全与发展。

在增进内部协作的同时，东盟还将与来自中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等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共商合作大计。其中，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将庆祝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15 周年，并着手推动这一关系提质升级，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1 推进东盟一体化

推进东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仍是本届东盟峰会的核心议题。东盟秘书长林玉辉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介绍，本届峰会将检视东盟在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方面取得的一系列进展，包括“东盟共同体愿景 2025”“东盟一体化倡议第三份工作计划”“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 2025”等文件的落实情况。

林玉辉介绍，今年以来，东盟进一步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便捷化，取消了几乎全部货物贸易关税，并正在敲定“东盟服务贸易协定”。

在电子商务和数字经济方面，东盟也有望取得重大进展。东盟经济共同体理事会会议将通过由今年 8 月东盟经济部长会议批准的“东盟数字一体化框架”文件。

林玉辉说，东盟的下一步重点在于全面实现“2025 年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深化市场一体化和跨领域协作，共同应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等新兴议题。

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新加坡提出“韧性”与“创新”两大关键词，意在加强东盟各国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和网络安全跨境威胁等方面的韧性，推动各国共同利用科技创新促进经济增长、改善人民生活。

2 维护多边合作机制

本届东盟峰会期间，多场多边合作领导人会议也将举行，包括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等。

长期以来，东盟将 10+3 合作机制视为推动地区稳定与繁荣的重要力量，将东亚峰会视作地区各国在政治、经济等各领域实现广泛对话与合作的重要平台。

在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东盟各国将在此次系列会议中重申对多边贸易体系的支持和对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原则的承诺。

作为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切实行动，东盟 10 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 6 个对话伙伴国正加紧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

林玉辉对 RCEP 谈判在今年年底前取得实质性成果表示乐观。“鉴于眼下全球贸易的不确定因素，各方对完成 RCEP 谈判的紧迫感增加，因此谈判在各层面均有所加强。”

中国驻东盟大使黄溪连近日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中国与东盟正共同发挥引领作用，力推 RCEP 谈判在年内取得实质进展。这也是中国与东盟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强有力行动。

3 加强中国—东盟合作

今年是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5 周年，即将在此次系列会议期间举行的第 21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也因此别具意义。

黄溪连介绍，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15 年来，双方关系充满正能量，共同开创了很多“第一”，而今年这份清单还将进一步拉长。双方已就“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 年愿景”达成一致，将提交第 21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通过并发表，由此中国又将成为第一个与东盟就中长期关系发展作出远景规划的对话伙伴国。

林玉辉表示，共同纪念中国—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15 周年将为双方关系注入新动力，而即将发表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 2030 年愿景”将为双方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作者：郜婕、赵青（记者）
来源：《经济参考报》2018-11